

六次危机

〔美〕R. M. 尼克松 著

六 次 危 机

下 册

〔美〕 R. M. 尼 克 松 著

北 京 大 学 法 律 系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 《六次危机》翻译组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72 年 • 北京

第五章 赫鲁晓夫

共产主义制造并利用危机作为武器。赫鲁晓夫这个到了危险顶点的共产党人，已经把这一技巧发展成为一门高度诡辩的科学。用来对付他的活动的各项计划，可能因为他的行为不可预测而变为无用，但为了避免被他的行为所打击而失去平衡，仍有精心制订计划的绝对必要。

“为战斗而进行准备的时候，我经常发现计划是无用的，但是，拟订计划是必不可少的。”

沒有比我和尼基塔·赫鲁晓夫于1959年7月在莫斯科的会见更具有戏剧性的例子，能说明艾森豪威尔总统喜用的这句格言的真理了。

我从来没有比这次准备参加同赫鲁晓夫的会见准备得这么好的。我在政府工作的十三年中，曾有机会获得共产党战略战术的一些还不算肤浅的知识。

在国内，作为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在阿尔杰·希斯案件中，我曾同共产党的阴谋策划面对面地较量过。

在国外，我曾会见过意大利、英国、希腊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并和他们长谈过；在南美，我曾看到了在行动中的共产主义的那一切残暴和恶毒。

我还不够资格在一般通用的意义上被称为共产主义的“专家”，可是我研究过当代共产主义的《旧约》先知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还有赫鲁晓夫以及当代共产党政策的观察家们的言论。

在这次旅行前的几个月里，我曾利用一切余暇时间，钻研从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白宫工作人员那里得来的报告和建议书。

我和我能够在华盛顿找到的那些会见过并了解赫鲁晓夫的每一个人都作过长谈。关于在我同赫鲁晓夫的会谈中可能涉及的一百多项不同的问题，都有人给我作了简要介绍。

我曾搜集并力图吸收我可能得到的关于赫鲁晓夫的点滴情报。

在我即将去莫斯科以前，我会见了来华盛顿访问的米高扬和科兹洛夫，这给我一个预先演习同赫鲁晓夫会见时可能遇到的问题的便利。米高扬和科兹洛夫在苏维埃官阶上，处在仅次于第一把手的位置。在我同他们个别长谈时，他们打出相当快的球和曲线球。但在和他们谈话之后，再会见赫鲁晓夫，就象从第二流球队转到第一流球队的投球法。他打出种种使人晕眩的球——使人眼花的速度，狡猾的曲线球，加上指节球、唾球、溜球、叉

球——都以迷惑人的变换步调打了出来。

我在世界各国对高级政府官员作礼节性的拜访，不下几百次，还没有碰到一位政府首脑在同我会见时用过这样长篇的下流淫秽的字眼，使得他的译员在译成英语时都脸红起来。

以前赫鲁晓夫也侮辱过他的客人，但这次他是在电视里干的，而且不是在一个普通的，而是在一个新的、革命类型的彩色电视带在苏联第一次放映的电视里干的。

他曾以导弹来威胁敌人，但从来没有站在一个美国厨房模型前面这样干过。

在午餐时间进行严肃的讨论，对他并不是希奇的事，但是使那些参加者的妻子们坐在一边，作为沉默而有极大兴趣的观察者，来静听概括美苏关系整个范围的五个半钟头的辩论，这却是空前的。

他有时带着他的客人们到莫斯科河上周游，可是这还是第一次他添了一个精采节目，那就是安排好几百个愉快的游泳者举行了“临时政治集会”来表明对他和对共产主义制度的热爱。

很明显的，没有可能作出计划来应付这种变幻莫测的行径。但是，如果没有几个月的计划准备，我就会在受到他的乘人不备的攻击的时候，狼狈溃退。

让我到苏联去的主意，是美国情报局副局长艾博特·沃什伯恩想出来并首先向我提议的，当时沃什伯恩正在拟订美苏文化交流规划。在我指明我愿承担这一任

务的时候，沃什伯恩便将这个建议的旅行呈报他的上司情报局长乔治·艾伦、当时的副国务卿克里斯·赫脱、福斯特·杜勒斯和总统，并得到了批准。

我去苏联的正式目的是为在苏联举办的第一个美国展览会，7月24日在莫斯科索科尔尼基公园举行开幕式。这个展览会是文化交流规划的项目之一。这项被采纳的规划是体现“日内瓦精神”，作为导致两国关系解冻的一种尝试。1955年的“日内瓦精神”没有持续多久，但是这个交流规划却是从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那次会见中产生出来的积极效果之一。头年1月，一个苏联展览会突出了苏联最近的科学进展，其中包括一个新的人造地球卫星模型，在纽约开幕。弗罗尔·科兹洛夫副总理代表苏联，我代表美国，在开幕式上讲了话。这个展览包含有浓厚的炫示苏联军事力量的意义。我们的展览会则在一位洛杉矶实业家查德·麦克莱伦的指导下，着重展出美国的消费品。它的必然结果是戏剧般地显示美国人和苏联人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差别。

因为科兹洛夫和米高扬接受邀请做过广泛的关于他们访问美国的电视广播，所以苏联政府也同意让我有在苏联全国电视广播中直接向俄国人民讲话的独特的机会。

我的访问也提供了同赫鲁晓夫举行高级会谈的便利，我能够阐明美国对世界问题的立场，而同时也为艾森

豪威尔总统和我们制定国策的人们就赫鲁晓夫对于美苏分歧的态度和意见，取得一些第一手情报。

在这次访问的最后安排经过莫斯科和华盛顿批准后，我开始搜集一系列提要，在我历次出国时，都没有做得这样精细。在柏林问题、原子试验和东西方贸易——这些都是尚待解决的问题之外，我还准备同赫鲁晓夫讨论一些特殊项目，如被苏联战斗机击落的 C-130 运输机上美国飞行员的长期失踪、旅行限制能否撤销、新闻检查、领事馆的开设、无线电广播的干扰、对一张美国公民的苏联籍亲属百余人离开苏联到美国与其家人同住名单的许可，如此等等。当然，有许多题目我已准备好了提要，而在我同赫鲁晓夫的会谈中并没有提到。这应归功于国务院及其他方面为我准备提要的工作人员们，赫鲁晓夫没有提出一个在我的提要所没有包括的问题。

除了这些提要以外，我还力图从在我前后同赫鲁晓夫谈过的人们中，寻求一个新颖的怎样去同尼基塔·赫鲁晓夫会谈的方式。

我找出一些研究过苏联事务的人和会见过赫鲁晓夫的人。我会见了休伯特·汉弗莱、艾夫里尔·哈里曼；我会见了在莫斯科访问过赫鲁晓夫的新闻记者，如比尔·赫斯特、鲍勃·康西丁、沃尔特·李普曼和特纳·卡特利奇。卡特利奇给了我一个从《纽约时报》主任编辑那里可以预期到的劝告。事实上他是这样说的：“同赫鲁晓夫会见时经常遇见的困难是他控制了谈话，结果使会谈变得

糊涂空洞，不着边际。你要抓住特殊的一点，你心里要有你要问他的明确的问题，一直追下去，直到你得到这样或那样的答复为止。”这个后来证明是说来容易，做到却难，我相信卡特利奇一定会懂得的。

同我谈过话的人，有的劝我把美国人的和平愿望向赫鲁晓夫“再度保证”，并试图寻求“他要什么”样的保证，才能消除他对于我们的力量是一个对苏联的潜在的侵略威胁的任何恐惧。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威廉·扬德尔·埃利奥特采取了恰恰相反的方针。他在写给我的一份详明的备忘录中说：“赫鲁晓夫并不需要我们再三对他保证我们是主张和平的，我们并不以侵略去威胁他。这个他知道。正是他本人在以侵略来威胁，并鼓吹全世界革命。我们应当告诉他，我们准备好在平等原则上和他谈判，但是我们决不受欺侮；我们愿意参加两种经济制度的和平竞赛；我们相信我们会赢，但是我们已经准备在必要的时候为捍卫我们的权利而战斗。”

我们的一位前驻莫斯科大使基本上同意这个方针。我记得他曾告诉我，1955年日内瓦会议后，美国官员们宣称他们相信赫鲁晓夫维护和平的愿望是“真诚的”等等，这些话是错误的。

我问他，“那么你的意思是赫鲁晓夫不要和平吗？”

他回答，“问题不是这个。赫鲁晓夫要的是整个世界。但是他和我们一样晓得现代战争的后果。所以他想

不通过战争来达到他的目的。在这种意义下他要和平。错误在于说他是真诚的。我们必须懂得，共产党人用的是与非共产主义世界完全不同的标准来对待世界问题的。我们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是唯物主义者。”

以后，他指着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张咖啡桌说，“就象你不能把这张咖啡桌子描写成真诚的一样，你不能把赫鲁晓夫或任何其他共产党人描写成是真诚的。他之所以主张和平并不因为他真诚地要和平，而是因为他相信他的征服世界的目标，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好是不通过战争来促其实现。”

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和德国总理孔拉德·阿登纳曾把他们个人对苏联总理赫鲁晓夫的评价告诉我。赫鲁晓夫曾用忽冷忽热的态度对待麦克米伦，甚至到了公开地奚落他的地步。麦克米伦用冰冷的矜持和庄严回答他的奚落，这是多少世纪来极为宝贵的外交经验使英国第一流政治家具备的矜持和庄严。赫鲁晓夫当即转变了过来，又充当彬彬有礼的主人。麦克米伦这次访问克里姆林宫，获得了对赫鲁晓夫的一个引起兴趣的而又不常被人识别的洞察。赫鲁晓夫十分骄傲地向这位英国首相一再炫耀俄国的国宝——就是旧沙皇帝国的金珠玉器。麦克米伦意识到赫鲁晓夫在拚命争取“被准予加入俱乐部，”就是说，凭他自己的地位，而不单单由于他代表了苏联的巨大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而被接受并被尊敬为一个世界重要人物。

阿登纳告诉我，“赫鲁晓夫想要统治世界，这是沒有问题的。但是他不要战争。他不愿统治一个破坏的城市和僵死的尸体的世界。”阿登纳也提到他自己和赫鲁晓夫之间的反映他们每一个人性格的一次交锋。在一个具体问题上，阿登纳坚不让步，赫鲁晓夫冲口骂了出来，“在我同意你这意见以前，我会看到你在地狱里。”永不显老的德国领导人回骂说，“如果你看到我在地狱里，那是因为我去了以前，你就在那里了。”经过这次交锋，阿登纳说，会谈的语调显然好转了许多。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给我的提要是最令人难忘的。1948年的一天夜里，为了和阿尔杰·希斯案件有关的事情，我去同他会晤。从那时候起，我在一生事业中遇到什么问题，就去请教他。他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忠告，在我的头脑里，留下了特别清晰的印象，因为他的忠告充满了内在的智慧，再则因为这是在他去世前和他的最后一次会面。

我相信，历史的裁决将把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列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伟人之一。而且在他一生最后几个月的痛苦生活中，他表现了更加英雄的气概。

他最后一次到欧洲去，于1959年2月10日回国，此后不久，我见到了他。他这次到欧洲，为了支撑我们的盟国来对付苏联关于柏林问题发出的最后通牒，曾在伦敦、巴黎和波恩停留。在2月2日动身以前，他已经知道自己害了不治的癌症。在旅程中随从他的人员谈到，在他

离开华盛顿的八天之中，他从来没有能咽下一口饭。他感受剧痛，夜里只好服用大量镇静剂，才能入睡。但在白天，他决不服用任何止痛药品，他怕服用以后，使得他的推理能力也会迟钝下去。

我问他怎么能够坚持参加历次的会议。他回答，说实话，只要会议一开，中间出现了争辩的题目，需要他完全集中注意力，这时候，他就毫不感觉疼痛了。随同他出席其他会议的国务院官员们告诉我，杜勒斯在这些会议中间把美国的观点解释得不能再清楚、再有说服力的了。他在病危时刻的表现雄辩地证明了“逆境打垮弱者而造就强者”这句谚语的真理。

在这期间，他总是想到别人，而不想到自己。他从不把自己的困难放在心上。在严肃的外表的里面，福斯特·杜勒斯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仁慈最体贴的一个。我举两桩和我有关的事情，来说明他的还不大为人们所知道的这方面的性格。

有一天，我和他在他的办公室同进午餐。他这天午餐食品中碰巧有新鲜无花果。我无意中提到帕特特别喜欢新鲜无花果，可是在华盛顿很难得到。两天以后，有一纸盒新鲜无花果从加利福尼亚州用航空快邮递送到我们家里，附有写给帕特的一张十分亲切的便条，来自当时在华盛顿最忙的忙人——福斯特·杜勒斯。

在他辞去国务卿以后，他从佛罗里达州返回华盛顿，进入沃尔特·里德医院度过他一生最后的日子。我到机

场迎接他，就象以前好几十次他作外交旅行出国归来时一样。我陪他乘车到了医院，然后回到我的办公室。当时已有通过白宫专线来的电话在等我。那是福斯特·杜勒斯打来的。他在电话中对我说明，他打电话只是为着告诉我他十分感激我到机场去接他。他又说，“你要知道，你实在不必这样做。”在他挂上电话以后，我想到福斯特·杜勒斯在他一生中曾经做过多少“他实在不必这样做”的世人永远不会知道的事。

当他住在沃尔特·里德医院期间，我曾和他有过几次长谈。我很注意在和他约定时间以前，心中要有一个向他请教的题目，这也是他要求我这样做的。他愿意他的一生在任何时刻都过着有益于人和建设性的生活，这一点，直到他去世的日子为止，他做到了。在我们的谈话中，常常讨论到我即将去到莫斯科的这次旅行。他对于和共产党领导人讲所谓的“个人外交”，有着比较阴暗的看法。他知道，共产党人不是要在这类会见中解决分歧，而是常常利用这类会见在宣传方面得到好处。但是他还坚决支持我到莫斯科去的建议。他告诉我说我们必须常常显出，我们宁愿尽一切可能同苏联在会议上，而不是在战场上来解决我们的分歧。他相信我在同赫鲁晓夫的会谈中，能坚守不退，他也认为这些会谈也许能够提供更多的对于赫鲁晓夫的战术和战略的洞察，这对日后他和总统的任何可能的会见是有帮助的。他还相信我也许可能利用展览会开幕这个讲坛，来向至少一部分俄国人民，

说明美国在一些世界问题上的讲理和公正的态度。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沃尔特·里德的总统专用套房的客厅里，他用靠枕垫着坐在椅子上。他的身体消瘦了而神志却和从前一样地清醒。他不住地吮咂着小方冰块，来减轻他咽喉的剧痛。大夫们告诉我，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我能见到他了。我问他那个关键问题：“我要使赫鲁晓夫理解的最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在重要问题上，杜勒斯从来不是一个迅速地做出回答的人。这次他比往常拖延得更久。然后他大概是这样回答的：

“我们用不着去说服赫鲁晓夫说我们是善意的。他知道我们不是侵略者也不威胁苏联的安全。他了解我们。但是他所需要知道的是我们也了解他。他说他赞成和平竞赛，但是他真正的意思是，他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只在我们的世界里而不在他的世界里竞赛。他说他赞成和平共处。他的意思，就象他在匈牙利所显示的那样，是说一个反抗非共产主义政府的革命是正当的，应当予以支持，而一个反抗共产主义政府的革命，必定是错误的，必须加以镇压。这样，他所鼓吹的和平共处表示着共产主义世界的和平，和非共产主义世界的不断的敌对和冲突。

“必须使他懂得他不能兼而有之。如果我们要作经济制度和政治思想的和平竞赛，就必须在共产主义和在我们的世界里同样地进行。他当然会否认他或他的政府同其他国家内的共产党活动有任何联系——这些活动不

过是人民反抗资本主义制度自发的忿怒的表现。把历史的记载逐章地指给他看。让他知道我们完全不信苏联领导人的假装的天真，因为我们有克里姆林宫在全世界活动的具体证据。应该告诉他说，如果他不停止这种活动，他的缓和紧张与和平共处的号召，就是一个完全虚伪和空洞的声音。”

四天之后，1959年5月24日，杜勒斯去世了。但是他的信念，在他死后将在我们这些有幸同他认识和向他学习的人中，永存下去。

我的旅行准备仍在继续。尼克松夫人和我跟亚历山大·巴明学习了一段通常俄语的速成课。我完成了我的笔记提要，还写出我将在展览会开幕时发表的演说。

在旅行安排上，同苏联人是照例有争论的。他们坚持我这一行人员用苏联喷气式飞机在他们国内旅行。他们试图把我的旅行限制在莫斯科，最后让步到允许我去参观列宁格勒和西伯利亚中部的两个城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新西伯利亚。他们不肯发给我旅行全国的通行证，象我们发给他们两位第一副总理米高扬和科兹洛夫那样。他们不让我穿过西伯利亚经海参崴出苏联国境。我用下述的一个决定回敬他们。因为我必须回到莫斯科，我就决定接受一个早就定下的邀请，在我离开俄国之后去访问波兰，而这个访问给我这一次全部旅行提供了一个难忘的高潮。

在我动身去苏联的前夕，我同艾森豪威尔总统举行

了一次有关这次旅行的最后会议。讨论了我的使命以后，他告诉我他已经决定邀请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他还授权我同苏联总理私下讨论这个旅行。对于邀请赫鲁晓夫这件事，正反两面的意见曾在政府里详细地讨论过。我了解在总统决定背后的超越一切的理由，这理由是我全心全意地赞同的：赫鲁晓夫到美国的参观访问，将给这位苏联领导人以相当崇高的地位，并且允许他对美国人民散播他的宣传，但美国定将得到更大的好处，因为在他穿过北美大陆收集第一手情报的时候，美国将以美国的面积、实力与精神来说服他。而且，我坚信，同艾森豪威尔总统作一次私人谈话，对于消释赫鲁晓夫心中的任何关于美国在世界事务的谈判桌上，站起来捍卫它的权利的意志和决心的错误印象上，将有很大的价值。我也相信总统到苏联的答访，对苏联人民将有一个远远大于赫鲁晓夫在这里所可能达到的影响。在我到苏联访问之后，这位苏联总理显然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不久之后，他抓住了 U-2 飞机事件作为借口，而撤回了他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邀请。

我们在 7 月 22 日晚九点零六分从巴尔的摩友谊国际机场，登上一架空军喷气式运输机离开美国。我的随行人员中有米尔顿·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弟弟；海军上将海门·里科弗，原子潜艇的奠基人；国务院专家们，我的办事人员，还有总统的美国展览会顾问委员会的代表们。大约有七十个采访记者、专栏作家和评论员们乘坐他们

自己包的“707”飞机从纽约起飞。

机场上有着多得惊人的群众。虽然我们试图强调这次期待的访问主要地是礼节性的，而新闻界和公众的兴趣还是很高的。米尔顿·艾森豪威尔在飞机起飞时指出，人们来到机场不仅是为了好奇，而是因为这次旅行包含有希望、神秘甚至有恐惧的一切因素。起飞之前，我收到了几百封对于我们在苏联的安全表示关切的信件。有些信件阴暗地提到头年在加拉加斯所发生的事件。

这中间也有滑稽的侧面消息。一星期之前我曾同司法部长比尔·罗杰斯玩高尔夫球。一架波音式“707”飞机正好从头上飞过。罗杰斯告诉他的球童说，副总统就要坐这种飞机到俄国去。球童倒喘一口气，问，“你是说他将飞到俄国去吗？”当罗杰斯回答说是的，那个约十二岁的男孩说，“他们不会把他打下来吗？”

在我们高高地飞渡大西洋到莫斯科去的时候，我对我们的身体安全没有什么顾虑。我的思想集中在我同赫鲁晓夫会见时我将采取什么行动。就我对可能出现的问题的一切情报而言，我相信这次我的准备，比我一生中应付挑战的任何一次做得都好。我的问题不是我知道的是什麼，而是怎样去用它。我完全体会作为一个副总统，我不能去同苏联总理谈判任何问题。但是我的谈话可以为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的互相访问，铺平道路，定下调子。在种种问题上，赫鲁晓夫将有随时改变苏联态度的有利条件。作为副总统我只能捍卫公开宣告的美国的态

度。我决定我要多听少说。对于赫鲁晓夫的思想和战术的任何更深的洞察，最后对艾森豪威尔总统将有所帮助。因为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柏林形势的谈判，正处在一个微妙阶段——陷入了动弹不得的停滞状态——我知道我又将处于一个多少有点习惯的境遇之中——在鸡蛋上行走。

我预期，根据他过去的做法，赫鲁晓夫可能采取一个好战的恐吓的态度。我知道我不能以同样态度回答他，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我不能冒“不惜翻船”的风险，或给他一个借口来中断日内瓦谈判。我决定完全拒绝这类的劝告，要我试图说服赫鲁晓夫，我们是“真诚地”希望和平，我们相信他真心实意地关心他的国家的安全会受到攻击，以及我们应该向他再度保证在这一点上我们愿意做出任何担保。我的信念是，赫鲁晓夫知道我们的和平愿望。正是他本人在言论和行动上都是侵略者，他傲慢地自认为生活的目的是赢得世界，使得我们的子孙将在共产主义之下生活。如有机会的时候，我相信我和他会谈的唯一最重要的目的，将是说服他，他不能希望他可以使美国改信共产主义，他也不能希望“赢得”（从这个词的传统意义上说）一场核战争。在1959年及以后，赫鲁晓夫夸耀说苏联能够破坏或摧毁欧洲的一切国家以及美国，而自己不会遭受歼灭。赫鲁晓夫绝不应相信他自己的宣传，仅仅因为苏联在导弹力量方面有了新的进展。

在进行这种类型的友好旅行的时候，我必须避免以